



聞一多

史 靖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多 一 聞

史 靖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汉

聞 一 多

史 靖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号)

武漢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850×1092 $\frac{1}{48}$ 开·2 $\frac{13}{24}$ 印張·49,000字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統一书号:11106·58

之改教風禮俗文學美術除不測製造機械
聖藥也狗彘也。嗚呼！我輩中華文明有五千年
人人也有顏色之人（彼種黃黑種人為顏色人）
得也。而後美國為尤甚，因由美國只知白種
在國時逆不知思家之真滋味。出國始覺
正式上課者得較佳之成績也。

欲節省書元但現共有五元之修裕。想下月
相視而嘆不啻牛衣對泣之楚囚也。在月原
錢君之脫略視我有過譽不及。貴二人其以為談。

內 容 介 紹

聞一多是抗日戰爭后期積極爭取國內和平民主的進步教授，抗日戰爭勝利後的 1946 年秋天被蔣介石反動集團謀殺了。本書系統的敘述了聞一多的出身、求學和長期教書、治學生活情況，以及在黨的教育幫助下，如何由一個不問政治脫離群眾的知識分子，終於成了一個堅強不屈的民主戰士的始末；同時也敘述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戰時期妥協投降、反共反人民的血腥罪行。

主呵！愿这腔珊瑚似的鲜血
染得成一朵无名的野花，
这阵热气又化些幽香给他，
好鑽进些路人底心里烘着罢！

——聞一多：“志愿”

是詩人，是学者也是民主战士的聞一多先生，1899年阴历10月22日誕生于湖北浠水的乡下。1946年7月15日的下午，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所暗杀，壮烈地牺牲于昆明。

在这不足四十八年的时间里，聞一多经历了祖国的苦难与忧患，目击着封建皇朝、新旧軍閥和各色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剝削和压迫，走过了他那曲折的充滿了矛盾的而终于找到了真理的道路。

聞一多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在所謂世家望族的环境里，无忧无虑地度着他的童年。当时，科举制度刚刚廢弃，新式学堂刚刚建立，聞一多在严格的家教督促下，在还不足五周岁的时候，就开始按着封建傳統的要求熟讀着“詩云”“子曰”，接着又得到风气之先，沿着他的家族和階級安排好的新的上进的阶梯，迅速从封建式的旧書斋走进到資产階級式的象牙之塔。

1913年，聞一多也随着許多达官貴人和豪門望族的子弟們一道，走进了美帝国主义者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錢——“庚子賠款”堆砌起来的“清华留美学校”。在这座亭园优美的清华园里，他整整度过了九年。

他是当年清华园内一个頗为知名的“文人”，曾經因模仿梁启超的笔法在入学考試时博得主考人的贊許；从1916年起，就是“清华周刊”和“清华学报”的积极撰稿者，以后并先后担任这两个刊物的总編輯和編委。国学根底較好，常常在刊物上写些旧体詩来怀古或述志，有时还喜欢写篇駢体，要以文会友。他是学校里勤

奮用功、成績優秀的學生，一直名列前茅；就是寒暑假期間讀書寫作也不間斷（特地把他暑假回家讀書二月的書房叫“二月廬”），涉獵的範圍很廣，從古詩辭到西洋的詩歌、散文，從歷代興亡的史實到達爾文的“天演論”都感到“興味盎然”。曾經寫過史論，評論過人物，還寫過詩話，他最早發表的比較長的作品“二月廬漫記”就是假期中分別用中、英文寫成的讀書筆記。“五四”運動以後，祖國的忧患和新思潮的影響，使這個年輕人對現實有了越來越多的想望，他開始用新詩的形式來表白自己的思想了，1920年7月，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首新詩“西岸”，接着又發表了詩論和其他作品，從此，進入了中國的詩壇，成為“五四”後新文藝園地里的拓荒者之一。

在學生時代，他也愛上了戲劇，在“五四”運動之前，就是清華話劇活動的積極參加者和組織者。但他最愛好的還是繪畫，當結束清華學習選擇留美專業時，他決心把藝術當成自己努力的事業。

聞一多的青春，生活內容很豐富，也生活

得很正直。在一味追求美国化的学校里，他曾經为反对歧视“国文”課而大声疾呼，为反对宣傳强盜文明的美国电影在清华上演而和人掀起过論战，还曾为美国文化騙子杜威在清华的講演公开地在“周刊”上表明了自己的不滿。这位沉靜好学的青年，成天在厚发濃眉下紧鎖着深邃的目光，对学校里的許多不合理的事情，总是勇于公正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他是当时清华学校学生运动中的一个积极分子。

“五四”运动爆发了的那一年，开始清华同学还在犹豫不决，聞一多深夜在飯厅的大門上貼了一張岳飞的“滿江紅”，用那深印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爱国詩篇激励着自己的同学。清华終于在整个北京进步学生的推动下，很快就正式投入这个划时代的偉大运动，他以全付精力担任着学生会的秘書和宣傳工作，并在1919年夏天，代表清华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学联的會議。

1921年，按照清华規定，聞一多已經应屆毕业，應該到美国学习去了。但是，就在毕业考試的前夕，北京发生了軍閥政府毆击国立八院校教職員請愿代表团的事件（当时軍閥政府

長期欠薪，教職員生活無着，組織了請願團，要求軍閥政府保障教育經費，軍閥們竟使用武力造成了血案）。北京大、中、小學立即罷課，抗議軍閥的暴行。清華學生不顧美帝國主義分子和學校當局的阻撓，也堅決地支持了這一正義的鬥爭，實行了罷課。反動的學校當局和美帝國主義支使的董事會對清華同學採取了高壓手段，企圖以開除來迫使學生終止罷課。聞一多也和許多正直的同學一道站在這個鬥爭的前列，沒有向這種反動的鎮壓正義鬥爭的手段屈服。學校當局接着便改換了手法來分化學生的團結，宣稱只要悔過，出國的照樣出國，升級的照樣升級，否則就以留級處分。聞一多在這個考驗的關頭，維護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尊嚴，他覺得自己並沒有做錯，寧可留級，也不能悔過。就這樣，別人八年畢業，他却被無理地推遲了一年，仍然留在清華。

聞一多在他走上人生大道的第一步時，經受住了這一次考驗。

1922年7月16日，聞一多離開了祖國。

还在旅途中，当許多青年同学都在为出国镀金而兴高彩烈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把去美国比作“流刑”。到了美国芝加哥才住了一个星期，就“已經厌恶这里的生活了”。在“孤雁”篇里，他这样形容这个金元帝国：

呵！那里是蒼鷹底領土——

那驚悍的霸王呵！

它的銳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

建筑起財力的窠巢。

那里只有銅筋鉄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底鮮血，

吐出些罪惡底黑烟，

涂污我太空，閉熄了日月，

教你飞来不知方向，

息去又沒地藏身呵！

聞一多沒有傾倒在銅臭的文明面前，而是凭着詩人的純真刺着金元帝国的痛处了。摩天大楼沒有使他象另一些人一样惊喜若狂，而是怀着“孤寂的流落者”的心情，在遙远的异国随时思念着祖国和家乡。

他在給朋友的信上写道：“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但是，不要誤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鳥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他写下了許多爱国思乡动人的詩篇（后来汇集成为“紅烛”詩集，于1923年出版），他說：

我要贊美我祖国的花！

我要贊美我如花的祖国！

本来决定在美国专攻繪画，他先后进了芝加哥美术学院、珂罗拉多、紐約大学等校，很快就感到“西洋画实在沒有中国画高”，他“日漸覺得我不应当作一个西方的画家”，并且沉痛地說：“我跑到这半球来，除了为中国多加一名留学生，我們实在得不着什么好处，中国也得不着什么好处。”因此，在美国住了还不到半年光景，就筹划着提早回国的事了。

按照規定，他應該在美国学习五年。但是，他說：“我不喜欢美国，美国的学生沒有中国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学生善于思想，勤于思想。他們在我眼里都是年輕的老腐敗。”当然，这些事情还不是他“不喜欢美国”的最

主要的原因。美帝国主义者的种族歧视，从他上岸的那一天起，就给他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在美国，不仅黑人受着非人的待遇，中国人也经常受到难堪的侮辱。比如说，租房子就常常遭到美国人的拒绝，在学校里也常常遭到白眼，在社会活动上照例要受到有色人种的遭遇，甚至连理发这样的事情，也常常会受到理发店的闭门羹。至于唐人街的同胞，在美国人眼里都是些下贱的人，就是留学生也免不了会有人问：“你爸爸是洗衣服的吗？”闻一多曾经怀着满腔的悲愤，写出了著名的“洗衣歌”，控诉着种族主义者对中国旅美的劳动人民的歧视。他一再把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叫作“缓刑”。在一封家书里闻一多愤慨地说道：

“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

他终于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当别的同学正醉心于学位的时候，他决定提前回国了。

1925年5月，聞一多回到祖国了。

当輪船駛进了吳淞口，他立刻脫去三年来束縛着他的洋装。从此，就一直穿着长袍布履，有时还穿上馬褂，冬天則把棉褲脚捆起，穿上一双朝靴，往往很难令人識出这是位从外国回来曾經以浪漫情調知名的詩人。

他正赶上偉大的“五卅”反帝运动。藏在他心底的爱国的热情，在上海无产階級和广大市民的怒吼声中更加熾热起来。他抑不住心中的喜悅，大声的喊道，这才是“咱們的中国”（他写的一首詩的題名）！

遺憾的是，聞一多虽然对帝国主义有这样的憎恨，对祖国那样的热爱，他的爱和恨，虽然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但从过去、从自己遭遇出发的多；三年的留美生活，虽然增长了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恶，但是，資产階級那一套脫离实际的教育，毕竟使得他对现实、对自己身外急剧变动的世界还缺乏正确的認識。他

凭着一个正直知識分子的正义感和善良的愿望，也同情人民在国内外敌人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但他对人民也并不了解。他的出身、他的学历以及他的朋友，也很快地就把他和人民的距离更加增大。

回国不久，他就担任了北京艺专的教务长，陶醉在浪漫情调的艺术生活里，他的家也变成了北京一批和他具有同样出身和同样爱好的詩人們的乐窩。他們创办了詩刊，值得提起的是，聞一多在創刊号上曾經针对当时軍閥政府屠杀青年的“三一八”惨案，写了“文艺与爱国”这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也創作了一些詩篇和具有独到見解的詩論。他是当年著名的爱国詩人。

那时候，他还很年輕，才不过二十七八岁，免不了有些少年气盛，曾經怀着很大的热望想用他的所謂国家主义来拯救中国。可惜的是，他一开始就踏上了歧途，和“新月派”一度搞在一起。他自己虽不懂馬克思主义，却对馬克思主义怀着资产阶级的偏見，想凭着他們那个小圈子里的几个知識分子来扭轉乾坤。

但是，很快地他就在那腐朽反动的旧社会

里，接二連三地碰了釘子。历史注定了資產階級的那套国家主义在中国沒有市場，脫離了工农大众的知識分子必然是一事无成的。他在无法逃避的人事糾紛中，无可奈何地不断改換着工作崗位；原来幻想在艺术、戏剧事业上能搞出一点名堂来，結果弄得自己也不能不改行，拋弃早年热爱的艺术了。热情容易激动的人，也很容易消沉。即使象北伐战争那样激动人心的革命斗争，也沒有能把他鼓舞起来（他曾在革命軍中担任过一个多月的艺术工作）。从此，便一直在象牙塔里，过着学者、教授的生涯。从1927年到1937年，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島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書。开始，他講授外国文学、英詩和戏剧，后来却完全轉向中国古典文学，連新詩也擱笔不写了。这样，就在他的生命史上，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轉变，从詩人轉变成学者。

这一个轉变，使他在古籍里几乎鑽了将近二十个年头。在这段漫长的時間里，他曾經远离了现实，在风光优美的青島海濱和宁静舒适的清华园里陶醉在古書的紙香中。这个知名的詩